

十七至十九世紀阿美族「秀孤巒二十四社」 的歷史變遷*

潘繼道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摘要

大巴隴（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塢）起至成廣澳（臺東縣成功鎮）止的花東縱谷與東海岸地區，是晚清後山中路的「秀孤巒（秀姑巒）」。

這裡的平地或丘陵地，原本是阿美族「秀孤巒二十四社」的重要分布地，但在近代發生巨大的歷史變遷。

伴隨「開山撫番」前南臺灣西拉雅平埔族的東遷、山區布農族的攻擊、木瓜番的襲擊、晚清清帝國官軍「開山撫番」的施行與攻剿……，改變其族群的活動空間、勢力範圍。

本研究期待藉由相關檔案、文獻、歷來研究的爬梳與分析，以瞭解從晚清「秀孤巒二十四社」到日治初期的「秀姑巒阿美」，其指涉空間的差異性，並試著探究其在花東縱谷的分布範圍與族群勢力消長。

關鍵字：秀孤巒（秀姑巒）、阿美族、秀孤巒二十四社、國家力量、歷史變遷

壹、前言

從今花蓮縣光復鄉的太巴塢，到臺東縣成功鎮之間的花東縱谷與東海岸地區，是晚清「開山撫番」下後山中路的「秀孤巒（秀姑巒）」^{*}。其主要的區域以秀姑巒溪流域為主，但還包括一部分的花蓮溪流域、東海岸秀姑巒溪出口南側與以北的地區。

這裡的平地或丘陵地，原本是阿美族「秀孤巒二十四社」的重要分布地，但在近代發生巨大的歷史變遷。

何謂「秀姑巒」？「秀孤巒二十四社」包含那些部落？其在近代遭遇那些挑戰與威脅？而在清日政權交替時期，其部落分布有何改變？日治初期的「秀姑巒阿美」與「秀孤巒二十四社」在指稱上有何不同？

本研究期待藉由相關檔案、文獻、歷來研究的爬梳與分析，以瞭解從晚清「秀孤巒二十四社」到日治初期的「秀姑巒阿美」，其指涉空間的差異性，並試著探究其在花東縱谷的分布範圍與族群勢力消長。

行文中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稱呼，除日文專書名稱與引文部分，仍依當時日本人的用字習慣使用「蕃」字之外，其餘皆使用晚清官方與漢人的習慣用字——「番」字，特此聲明。

貳、何謂「秀姑巒」？

東臺灣地區重要的三大流域，包括花蓮溪流域、秀姑巒溪流域、卑南溪流域。「秀姑巒」最初並非作為河川或流域的名稱，而是以地名、山名、地區、族群的稱呼登場，其歷經晚清至日治時期才成為河流的名稱。

* 首先，感謝內人黃郁清（國風國中歷史科教師）於花蓮縣境內原住民部落相關資料蒐集、內文討論時給予的提醒，以及內弟黃信元對英文摘要之修正與建議，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給予的審查與修改意見。文中若仍有不妥之處，乃筆者才疏學淺所致，仍應由筆者本人負責。

以地名出現在相關文獻上，從十七世紀的荷西時期即已見到。

從荷西時期以來，今秀姑巒溪口的村社，最常以 Tsiporan 或 Chupre、Supera、Supra、Soupra、Soupera、Chiporan……等的羅馬拼音地名，或芝舞蘭、芝寶蘭、泗波瀾、薛坡蘭……等的漢音諧音字地名出現，而為人所認識；清帝國時期又再加上納納（Lavlav、Davdav）、阿棉社（或阿棉山，Amisan）、北溪頭社等地名。

據說 Tsiporan 的名稱，可能來自於阿美族語的 tsipo，乃「河口」之意，an 是「地方」、「場所」的意思。廣義的 tsipo，有時也包含其對岸的納納社，在納納社有人將溪流出海口的南北方兩社合稱為 Tsiporan 社。¹

西班牙人希望以臺灣作為基地，一方面可以進行貿易，以防止荷蘭人獨佔轉口貿易的利益；一方面擴展對中國、日本方面的傳教；另外，佔有臺灣將可阻止日本經由臺灣入侵南方的呂宋等地。

當時西班牙人曾征伐、控制北臺灣及噶瑪蘭地區（1634 年）的原住民族社，在其所認知的空間上，將北臺灣地區分成淡水（Tamchui）、噶瑪蘭（Cabran）及哆囉滿（Turoboan）三個省區，但可能並未真正將勢力延伸進入後山地區。² 他們對後山族社名稱的記錄，可能得自於前來探尋砂金的探險家。其中，在哆囉滿（Turoboan）底下有 Chupre（豐濱鄉港口村，大港口）。

1632 年，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在其所寫的《艾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對於東臺灣地區（今花蓮縣境內）部落概況有少許的著墨，一些聚落更提及「只有金礦」或「有金礦及銀礦」，其中，Chupre 即提到是「一個聚落，有金礦及銀礦」。³

1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年），頁 178；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 年），頁 540；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 年），頁 178。

2 鮑曉鷗撰文，黃提銘譯，〈被征服的世界——十七世紀西班牙文獻資料中的臺灣北部原住民〉，收入《尋訪凱達格蘭族—凱達格蘭族的文化與現況》（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 111；鮑曉鷗撰文，李毓中譯，〈對《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一書之評論〉，《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58 期（1998 年），頁 41。

3 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 124。

1630 年代末期，荷蘭人為探尋黃金，從南臺灣進入東臺灣，因為黃金的傳說與探金活動，荷蘭人也曾與秀姑巒溪口北側的村落（部落）Supera（豐濱鄉港口村）有所互動、直接接觸，當時 Supera（Soupera、Supra……）以許多不同的羅馬拼音字的名稱，出現在荷蘭人的記錄中。⁴

而在指稱山名的部分，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於〈山川（附島嶼）〉中記載：「秀姑巒在水尾西五十餘里。其山高聳，甲於臺東」。⁵「秀姑巒」在此是高山的名稱，是指中央山脈的最高峰，3825 公尺的秀姑巒山。

而在清帝國時期，「秀姑巒」也指稱後山重要的地區，然而在其認知的空間、範圍上，即使是「開山撫番」後的重要官員，仍出現不同的地區界線。

於光緒 3 年（1877）福建巡撫丁日昌上奏的〈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附臺灣中路築城防守片）〉，提到：

自新城起至大巴隴止，約一百里，是為北路之岐萊；自大巴隴起至成廣澳止，約一百餘里，是為中路之秀孤巒；自成廣澳起至阿郎臺止，約一百餘里，是為南路之卑南……。⁶

亦即從今新城鄉新城村到光復鄉的富田（太巴塢）地區，為北路的「奇萊」，跟一般日本官員與學者於日治初期所認知的「奇萊」不同。⁷而「後山中路」涵蓋海岸山脈兩側，從今光復鄉至成功鎮都屬於這個範圍，不單單只有花東縱谷，還包括海岸山脈的東側。⁸

4 潘繼道，〈近代東臺灣秀姑巒溪口的族群互動〉，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第 3 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頁 2-7。

5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7。1 清里，約等於 0.576 公里。

6 丁日昌，〈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附臺灣中路築城防守片）〉，收於《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年），頁 87。

7 日治時期的「奇萊」，指涉的空間是北到新城，東到海，西到山，南到吳全城（今東華大學與其鄰近地區）。引自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8 年），頁 28-29。

8 後山中路清帝國真正能控制的，主要在花東縱谷及東海岸的平地與丘陵，山區的族社幾乎是無法駕馭，只能依靠通事等加以攏絡，亦即真正統治的地區，只有光復鄉、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豐濱鄉，及臺東縣的池上鄉、關山鎮、長濱鄉、成功鎮等，並不包括花蓮縣的萬榮鄉、卓溪鄉與臺東縣的海端鄉。

但如果再看夏獻綸於《臺灣輿圖》中的〈後山總圖〉，其北路歧萊（奇萊）與中路秀孤巒的交界，是在今吉安鄉與壽豐鄉交界的木瓜溪；而中路秀孤巒與南路卑南的交界，即是今花蓮縣富里鄉與臺東縣池上鄉的縣界（請參閱圖 1）。



圖 1 後山中北路庄社與歧萊秀孤巒卑南交界圖

資料來源：黃清琦編，《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年），頁 88-89。

說明：◎或◎上再加三角旗者，為清光緒年間勇營的駐紮處。

至於「秀孤巒（秀姑巒）」作為溪流的名稱出現，應該是晚清至日治時期，因為直到《臺東州采訪冊》，秀孤巒（秀姑巒）還不是溪流的名稱。

清帝國統治後山時期，並沒有「秀姑巒溪」的稱呼，胡傳的《臺東州采

訪冊》稱其下游的襲奪部分為「大港」或是「九曲溪」，該書提到：

大港 水有二源：其南源出新開園（池上鄉錦園村一帶）之西四十里網網社山中，西北流至大陂（池上鄉大波村）之北出山〔按：應該是向東北流才對〕；俗名網網溪。北流五里經公埔（富里鄉富里村）之西，又北五里，濁水溪（拉古拉古溪、樂樂溪）自東南入焉〔按：應該是自西南才對〕；又北七里至大莊（富里鄉東里村）之西，阿眉溪自東南入焉，清水溪自西出山入焉；合流為大密納河〔按：指的是支流塔比拉溪，或稱太平溪，但塔比拉溪實際位置應該在玉里鎮北方大禹里與三民里交界處〕。又北經客人城（玉里鎮源城里客城地區）、萬人埔（即蠻人埔，富里鄉萬寧村）之西十五里，至璞石閣（玉里）之東；又北二十里，西經迪街（玉里鎮三民里）、東經觀音山（玉里鎮觀音里）、龜立埔（不詳）而至水尾（瑞穗鄉瑞美村、瑞良村一帶），與挖鈴拗溪（馬蘭鈎溪）合流。其北源曰挖鈴拗溪（馬蘭鈎溪），源出秀姑巒山中，東南流至拔子莊（瑞穗鄉富源村、富民村）之南出山。南流經化良社（原烏漏社，瑞穗鄉鶴岡村）之西十五里而至水尾之東，合大密納河東流，始名大港。亦曰九曲溪：以行山間，兩岸峭壁挾之，使左旋右折，凡九曲；歷二十五里，乃入於海也。其入海處，名大港口（豐濱鄉港口村）；左為獅山、右為象山。口外海中突起一石，形頗似球，名獅球嶼。南北分二港：前者水深，大船可入泊口內。今南港已為沙磧淤塞；北港尚通，船載三百石者可入。其口南距成廣澳（成功鎮）七十五里，北距花蓮港（吉安鄉東昌村海邊）百十有五里。⁹

另外，根據日治初期（明治 29 年，1896）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技師田代安定與原民政局技手坂基於《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一書中所繪製的〈臺東

9 胡傳，《臺東州採訪冊》，頁 9。

住民各種族播布區域圖〉，將秀姑巒溪稱為「秀枯巒溪」。¹⁰ 溪流名稱可能在晚清至日治初期出現。

而在原世外的〈植民地としての臺東〉，則將秀姑巒溪寫成「秀孤巒溪」，其同時補充提到溪流名稱又稱為「水尾溪」。¹¹

至於「秀姑巒」作為族群，以及其所包含族社的部分，接著即來探述。

叁、「秀孤巒二十四社」的組成？

後山中路的阿美族族社，在晚清時期有不同的稱呼出現，包括「秀孤巒二十四社」、「大巴籠（太巴塢）等二十社、馬達安（馬太鞍）等四社」、「水尾南北川丁仔老（丁仔漏）等二十四社」等。其中，除了「秀孤巒二十四社」指涉範圍跨越海岸山脈之外，且有明確說明各部落名稱之外，其餘則無法確定是否涵蓋海岸山脈兩側。

以下先來談「大巴籠等二十社、馬達安等四社」與「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接著再來探究「秀孤巒二十四社」。

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提到：「花蓮港之南，經周樹人派弁譯造木瓜等社、大巴籠等二十社、馬達安等四社……」，¹² 其並未說明「大巴籠等二十社、馬達安等四社」包括哪些番社，且此稱呼其後並未於日治時期被延續使用。

而劉銘傳在光緒 13 年（1887）的〈奏臺灣各路生番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疏〉中，曾使用「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其提到：

臣當檄署臺灣鎮總兵章高元統帶礮隊並鎮海中軍前營、「定」字

10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住民各種族播布區域圖〉，《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頁 33 前之圖。

11 原世外，〈植民地としての臺東〉，《臺灣協會會報》，23 號（1900 年），頁 23。

12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頁 54。

左營及練兵七百人兼顧石工、民夫由彰化境之集集街開山而東，張兆連由水尾開山而西，兩面刻期會辦。章高元率勇由拔埔社開至丹社嶺，計修路一百二十二里；張兆連自水尾開至丹社嶺，計程六十里：均係崇山峻嶺。該鎮等鑿石伐木，自冬至春，一律修竣。張兆連當乘開山軍勢，即派管帶黃定國、畢寶印先將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餘人招撫歸化，一律薙髮……。¹³

但不管是「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抑或是「水尾南北川二十四社」，其並未清楚說明是由哪二十四個社所組的，而且族群稱呼也同樣沒有被延續使用至日治時期。

而早在「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出現之前，夏獻綸於《臺灣輿圖》〈後山輿圖說略〉中的「附錄番社」，就先行使用了「秀孤巒二十四社」。即使在日治初期其指涉空間不再跨越海岸山脈，但仍以「秀姑巒阿美」的名稱，繼續被沿用了。

「秀孤巒二十四社」包括大巴籠社（太巴塢，tavarong）、加露巒社（加路蘭，karoran）、馬大鞍社（嗎噠唵、馬太鞍，vataan）、馬見弄社（maklun）、則朱芒社（satsivong）、本老安社（punoan）、貓公社（vakon）、新社仔社（新社）、麻吉蛋社（晚見蛋）、琅仔山社（貓公山、貓公山，tsilangasan）、阿棉山社（amisan）、膏肓社（koyo）、周武洞社（chiota，或稱阿多蘭，atolan）、人仔山社（langasan）、烏漏四物社、無老僧社（molotsan）（以上四社乃拔子 pairasun 四社、拔子莊四社）、奇密社（奇美，kiwit）、納納社（lavlav）、烏漏社（orau）、大肚偃社（taraaran、taitoatsu）、周塢社（sulou）、加納納社（karara）、烏鴉立社（orarip）、奇竹社（不詳）。¹⁴

1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年），頁265。

14 夏獻綸，《臺灣輿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77-78。羅馬拼音的社名，筆者大致參考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5年），頁15-22；以及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257-265的片假名。

「秀孤巒二十四社」，分佈於花東縱谷與東海岸，包括今光復鄉、瑞穗鄉與豐濱鄉的轄區。其中，應該包含主社與分社，是晚清統治後山當時官員或當地居民對於鄰近族社的認識，其大部分部落都可以跟現今的行政村落相對照；但有些部落則必須透過相關文獻或是地圖，才能找到其應對位置。其與現今行政村落的位置對照部分，請參閱表 1。

表 1 光緒初年秀孤巒二十四社一覽表

社名	位置	備註
大巴籠	光復鄉太巴塢富田地區	花東縱谷花蓮溪流域
加露巒	豐濱鄉磯崎村	東海岸
馬大鞍	光復鄉馬太鞍	花東縱谷花蓮溪流域
馬見弄	此三社亦屬於馬太鞍	花東縱谷花蓮溪流域
則朱芒		
本老安		
貓 公	豐濱鄉豐濱村	東海岸
新社仔	豐濱鄉新社村	東海岸
麻吉蛋	光復鄉馬太鞍附近（與馬見弄同一個部落的不同漢譯字？）	花東縱谷花蓮溪流域
琅仔山	豐濱鄉豐濱村	東海岸
阿棉山	豐濱鄉港口村	◎東海岸秀姑巒溪出口北側
膏 育	瑞穗鄉瑞祥村、萬榮鄉紅葉村一帶	可能是「高藥社」（koyo）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周武洞	此四社乃 pairasun 四社、拔子莊四社，屬瑞穗鄉富源、富民、富興等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人仔山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烏漏四物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無老僧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十七至十九世紀阿美族「秀孤巒二十四社」的歷史變遷

奇 密	瑞穗鄉奇美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納 納	豐濱鄉靜浦村	◎東海岸秀姑巒溪出口南側
烏 漏	瑞穗鄉鶴岡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大肚偃	瑞穗鄉富興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周 望	瑞穗鄉富興村與鶴岡村附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加納納	瑞穗鄉舞鶴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烏鴉立	瑞穗鄉鶴岡村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流域
奇 竹		位置不詳

資料來源：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78；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7-267、289-291；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13-28；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95-211；張振岳，〈玉里鎮〉、〈豐濱鄉〉、〈瑞穗鄉〉，收於潘文富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83-135、229-252、253-286；潘繼道，〈清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的「烏漏事件」〉，《東臺灣研究》，17 期（2011 年），頁 11。

說明：屬於秀姑巒溪流域者，筆者另加上◎。

從「秀孤巒二十四社」的記載來看，以夏獻綸為代表的清帝國官員等所瞭解的今豐濱鄉阿美族部落遺漏了一些，例如在光緒 3 年（1877）閩浙總督何璟〈奏陳阿棉老番馬腰兵等詭降受誅及現在番情安貼片〉，提到清軍攻擊後山中路阿棉山、納納等阿美族部落抗清事件時，遭焚燬的姑律（豐濱村立德社區）、大蘇圓（距大港口 20 里，可能在港口村石門一帶），就並未被記載在其中。¹⁵

除開東海岸的姑律、大蘇圓之外，花東縱谷的沙老社（砂荖社，光復鄉南富村）也曾遭清軍攻擊。關於沙老出現的時間，石磊提到：

15 何璟，〈奏陳阿棉老番馬腰兵等詭降受誅及現在番情安貼片〉，收於洪安全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年），頁 2863-2865。

砂朥……她不見於臺灣輿圖的秀姑巒二十四社，卻見於臺東州採訪（採訪）冊。前書成於光緒五年，後書成於光緒二十年。如果不是前書的作者夏獻綸先生遺漏的話，則該部落當於光緒五年至二十年十五年間建立。¹⁶

但從何璟的奏摺，可以確定夏獻綸的記錄是有遺漏的，沙老社在衝突中更曾遭遇部落被焚燬的厄運。但也可能是沙老在當時是屬於太巴塌社底下的小部落（分社），因此，並未將其獨立書寫。

此外，從表 1 中可以見到，位於今豐濱鄉的加露巒、貓公、琅仔山、阿棉山、納納在當時應該是屬於阿美族的部落。至於新社仔，則並不清楚是屬於阿美族或是噶瑪蘭族的部落。因為社名的拼寫，到底是跟前後一樣地以阿美族語發音（sinsya?）所形成的音譯漢字，或是原本就屬於閩南語（河洛話）的漢字，代表的是新的社？

在夏獻綸《臺灣輿圖》的〈自序〉中提到：

獻綸備兵來此，適值海疆多事，朝廷遂有開山撫番之命。臺之南北，遞歲周巡；轍跡所由，多涉無人之境。而內山道途、形勢，為從古方輿所不誌。獻綸則欲詳悉為圖，俾回曲寫遠，瞭然尺幅；而民番生聚、村落聯屬，咸有所稽。因命山陰余二尹寵周歷各屬，創為之圖；凡再易寒暑，始竣。而後山圖，又數易；惟嘉應王君熊彪有稿為優，並採用之……。¹⁷

再參照書中所附的〈臺灣後山總圖〉，可以見到「巾老耶」的地名，而非「歸化社」，¹⁸亦即該圖應該是繪製完成於光緒 4 年（1878）「加禮宛事件」之前，而該圖就有「新社仔」的地名。

16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19。

17 夏獻綸，〈自序〉，《臺灣輿圖》，頁 1。

18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1。

此外，在詹素娟的博士論文〈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00 年）〉中，也推斷抗清事件之前「新社」即可能已經成立了；而從清水純的研究可以確定的是，新社最早出現的噶瑪蘭人，可往前追溯到光緒 4 年，是從加禮宛（新城鄉嘉里村）遷來。¹⁹ 如果詹素娟與清水純的推論與研究成立的話，那麼新社仔原本就應該是阿美族的部落。但目前因資料不足，無法確證，亦暫時存疑。

然而對於東海岸，無疑地在噶瑪蘭族於清道光年間南遷奇萊平原之前，老早就熟悉當地的地理環境。

在清嘉慶 8 年（1803），日本人文助因船隻故障，漂流到秀姑巒溪口，並在當地生活了四年多，在其見聞中曾提到：在當地從仲夏到初秋之間，海邊會有稱為ガバラ（カバラン，Kavalan）的賊夷船來此，其船隻形體細長，搭乘人數二、三十人，容貌怪異，穿著各種顏色的彩衣，頭上戴著插上各種顏色鳥類羽毛的冠，在海邊騷擾、呼嘯而過，當地的夷人（阿美族人）對他們非常恐懼，從仲夏到初秋之間都不敢到海邊去。²⁰ 但噶瑪蘭人是否因此而老早即在東海岸建立「新社」部落，同樣是證據不足，在此亦暫時存疑。

接著，即探究必須透過相關文獻或是地圖，才能找到其應對位置的部落。

麻吉蛋社，在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中未見到記錄，但在日治初期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中寫成「晚見蛋社」（バンケンタン，bakentan），通事與本老安社同。²¹ 筆者推測其部落位置應該就是在馬太鞍

19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00 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頁 233-234。

20 秦貞廉編輯，〈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ヨプラン嶋之記〉，收入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編輯，《愛書》，第 12 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1940 年），頁 47-48。

2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8。

附近，位於今光復鄉。

馬大鞍即馬太鞍、馬太安、嗎噠唵，在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水尾附近各社〉提到馬大安社、良化社、善化社、則朱芒社四社相連；而在〈附各社通事〉中，記載則朱芒社設置通事 1 名；馬大安社則提到其設置通事 1 名，兼管良化、善化兩社。²²

良化社與善化社，應該就是由馬見弄社、本老安社更名而來，至於各由哪個社更名而來，從晚清到日治時期的文獻資料，都未曾明確記載，²³ 甚至常以「馬太鞍社」的集體名稱標示於地圖上。

不過，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木瓜溪至水尾溪（秀姑巒溪）北岸」庄社名的統計資料中，則並未看到馬見弄社的相關記錄。²⁴ 但前述麻吉蛋社的發音，筆者懷疑其與「馬見弄」是同一個部落的不同音譯漢字。

如果再將劉斌雄等人的《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中的馬太鞍社（馬太安社）的「鄰里分佈圖」（請參閱圖 2），²⁵ 與目前行政村落名稱與區域對照，馬太鞍社又稱為 *matakea*，位於今大平村；馬見弄社位於今大馬村，本老安社位於今大平村，則朱芒亦位於今大平村。²⁶

22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9。

23 如果依照《臺東州采訪冊》「馬大安社、良化社、善化社、則朱芒社」四社相連排列的順序來看，筆者推測馬見弄社曾改社名為良化社，本老安社則曾改社名為善化社（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1）。不過，因為仍無文獻可以提供證明，此一問題只能暫時存疑。

2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7-267。

25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171。

26 此外，根據耆老的口述歷史資料，*Makereng*（馬可任，亦即「馬見弄」）位於光復國小南方，阿美族語是指「水聲隆隆」，以前因河水改道而襲入該區，使得常聞水聲作響，因而得名；*Beno'an*（本諾安，亦即「本老安」）阿美族語是指「丘陵間平坦之地」，位於納骨碑東北方附近一帶；*Cacifong*（雜集風，亦即「則朱芒」）位於現在垃圾掩埋場附近，以前為怪異疾病（如癲瘋病人）集中管理治療之地；*Fata'an*（馬太鞍）位於納骨碑以東，與保安寺以西之間，因盛產馬太鞍豆（即「樹豆」）而得名。這些耆老的口述歷史資料，原載於光復鄉公所於民國 86 年（1997）出版的《今日光復》。本文所參閱者，為康培德編纂，《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 年），頁 105；以及「花蓮縣光復鄉大馬太鞍社區發展協會」，收於「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網址：<https://welfare.hl.gov.tw/home/community/community-resource-front/update/52c527c37862e62201786343519004fa>（2022 年 7 月 22 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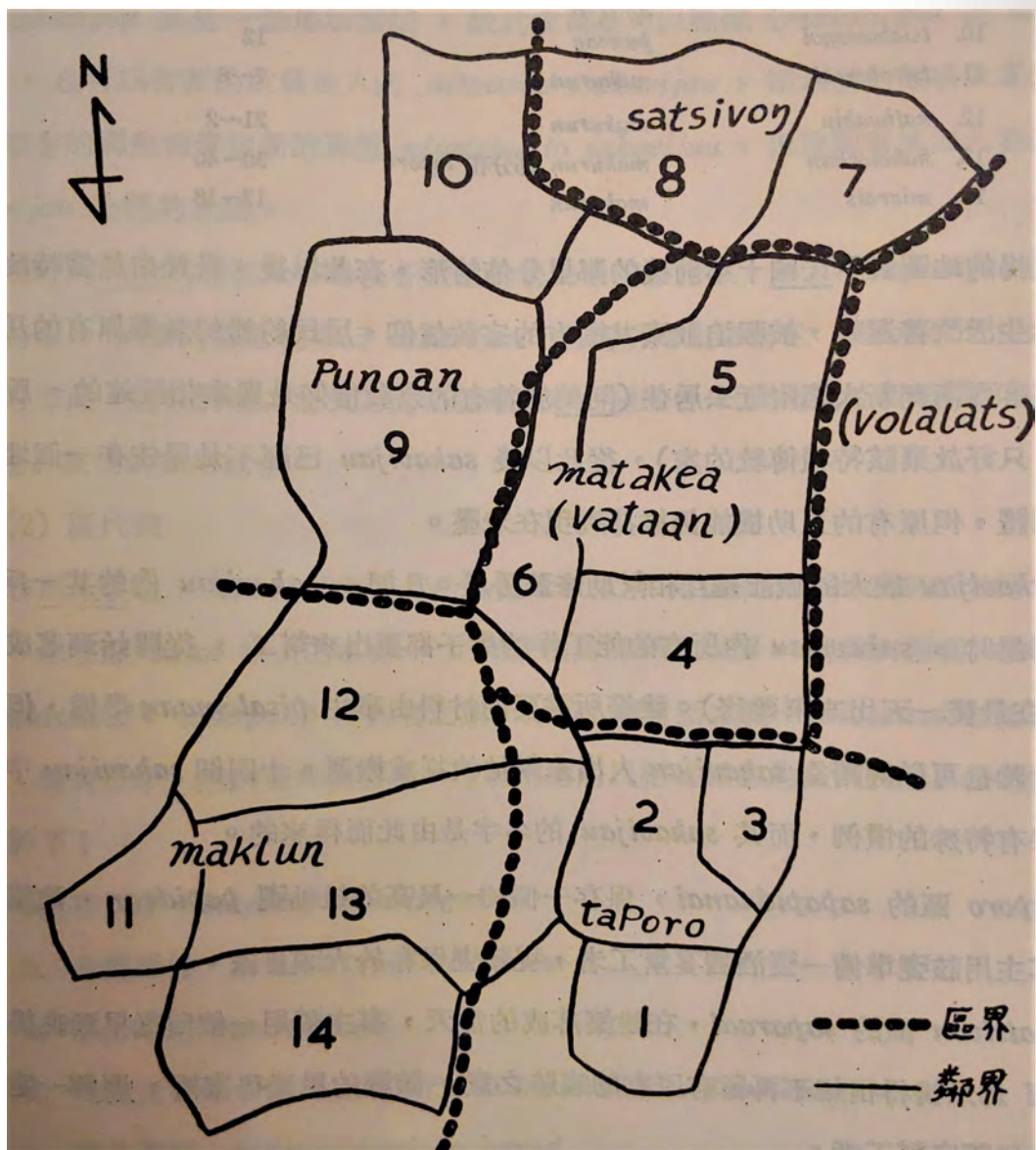


圖 2 馬太鞍社的「鄰里分佈圖」

資料來源：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171。

周望社在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的《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與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等所著的《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中，

認為位置是在今玉里鎮的大禹里，即過去所稱的「針塋」；²⁷張振岳也於《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玉里鎮〉的辭書資料中，將其置於大禹里。²⁸

但如果參照夏獻綸《臺灣輿圖》中〈後山輿圖說略〉附錄道里的資料，則是「……大巴籠、二十二里周塋社、二十二里秀孤巒水尾……」，²⁹也就是說，周塋社約位於今光復鄉富田地區到瑞穗鄉瑞美國小的中間；而在所附的〈臺灣後山總圖〉中，則是在拔子庄南邊；不過馬大鞍社位置明顯錯了，標示在拔子庄西邊，應該北移到中溪洲駐兵點的西側。³⁰又依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周塋社（スロー，sulou）是由高溪坪社（瑞穗鄉鶴岡村）通事張維賢所兼管，³¹而且在書中所附的〈臺東住民各種族播布區域圖〉，也將周塋社放在拔子庄東邊。筆者推測，周塋社應該是在富興村至鶴岡村附近，而不是在大禹里，因為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中同時也存在著新塋庄（即針塋），但非針塋社（庄屬漢人或平埔族聚落），且在日治初年阿美族人數只有 3 人。

另外，在日治初田代安定的調查中，曾收錄光緒 3 年 10 月 17 日張芳茂、羅兆等開墾打馬烟（打馬煙，瑞穗鄉瑞北村）的鄰近地區，因發生土地糾紛，經官方介入調解後所留下的曉諭文書。³²從文字中可以判斷，膏肓社大致位置在瑞穗鄉瑞祥村、萬榮鄉紅葉村一帶。而膏肓社可能就是「高藥社」（koyo），在《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中，提到高藥位於瑞穗以西 2 公里餘，在紅葉溪左岸、虎頭山南

27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花蓮：作者自印，1985 年），頁 163；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 144。

28 張振岳，〈玉里鎮〉，收於潘文富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頁 116。

29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6。

30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1；黃清琦編，《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 89。

3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63-264。

3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103-104。

麓，即今瑞穗溫泉下方山麓，行政村落為今瑞穗鄉瑞祥村，後遭布農族襲擊而遷社。³³

至於奇竹社，不清楚其部落的發音為何，是目前無法對應的部落，在此就先暫時擱置。³⁴

肆、近代「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外來威脅

包括「秀孤巒二十四社」阿美族在內的所有原住民族各社，原本皆有其傳統領域，且都有守護自己「傳統領域」的義務。在國家力量尚未進入、建立統治之前，原住民族各社以其自己的方式、行為法則，與周遭的族群展開互動，並不受國家律令的約束。

從前原住民族的社會中，「社」（部落）的概念比較強，但並沒有「族」、「同族」的概念，因此，同族間的各社可能發生征戰，而異族的鄰近番社卻可能是攻守同盟的朋友。基本上，原住民會優先考慮自己部落的利益，但在彼此通婚，具有血緣或姻親關係，或是面對相近的惡劣處境時，為了族群的生存，他們會結盟共同打擊入侵、壓境的強敵。

一般的原住民族群，對於其所居住或勢力範圍內的土地，乃將之視為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寶物，即使是只有一小塊，也不允許將之出讓給其他族群。現耕地當然不可能出讓給別人，其他曾耕作、種樹及居住過的土地，他們也都將它視為是自己的土地。

原住民族群對於土地的界線相當清楚，像是在狩獵地方面，各族、各社都重視其族群發展的歷史（傳統領域），藉此以主張其對於該土地的權利。

33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153；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 136。「紅葉」地名，即是日本人依照「高藥」的發音 koyo，轉成日語發音的「こうよう」而來。

34 筆者曾懷疑「奇竹」是縣道 193 的德武（Satefo，謝竹武、蛇竹窩、謝德武、下德武，玉里鎮德武里）。

他們相信如果同意其他族群侵入他們的領地，將觸犯祖先而引起憤怒，如此將會發生疫癘侵襲，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災厄。在其觀念中，認為祖先與自己是土地的所有者，對於進入傳統領域的其他族群，認為是妨礙其族社的治安而加以誡首（獵頭）。³⁵

此外，在國家力量進入部落統治之前，各個原住民族群依照自己的需要進行遷徙，其原因可能是狩獵的緣故，或是為了追求土地，甚至是為了躲避自然或人為的災難。

筆者曾試圖依照時間順序，來探述近代「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外來威脅，但發現有其難度，因為除非是國家力量、外來者有明確文獻記錄時間者之外，各族社之前的傳說往往都無法清楚地將確切的時間呈現。因此，只能依照「與西方國家及越獄者的接觸」、「與非『秀孤巒二十四社』阿美族番社的衝突或戰鬥」、「卑南族的威脅」、「布農族人的襲擊」、「西拉雅族人的東移」、「木瓜番獵首的威脅」、「晚清國家力量與漢人侵墾的威脅」等來進行論述。

一、與西方國家及越獄者的接觸

「秀孤巒二十四社」在近代常出現與周遭族社展開零星或大規模的戰鬥、衝突，也曾發生遭受荷蘭東印度公司軍隊的攻擊，甚至遭到匈牙利人（事實上為今斯洛伐克共和國，當時隸屬於匈牙利）貝尼奧斯基（Maurice August Beneowsky）襲擊的事件。

原住民族社間的零星戰鬥，對「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影響不大，大致上雙方確定勝負之後即達成和解；而與西方外國人的接觸，也只不過是「秀孤巒二十四社」歷史發展中的短暫小意外而已，並未留下太多影響。

1630 年代末期，荷蘭人曾因探查黃金產地而來到東臺灣地區。當時荷

35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22）——臺灣（2）》（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年），頁 394-395。

蘭人與卑南族的卑南社密切互動，也試著透過卑南社與鄰近地區結盟。

荷蘭人曾征伐反抗的馬太鞍，或藉由卑南社攻擊泗波瀾（Chupre、Supera、Supra、Soupra、Soupera、Chiporan……，大港口）等「秀姑巒二十四社」的番社。但在產金地點的探查無法進展，並獲致好的結果時，荷蘭人對於東臺灣不再大規模派兵行動，「秀姑巒二十四社」也擺脫了荷蘭人的威脅。³⁶

清乾隆 36 年（1771），貝尼奧斯基這群外來的越獄漂流者，意外地對秀姑巒溪口的阿美族部落進行血腥殺戮。但隨著貝尼奧斯基北上攻擊臺灣東北部地區的原住民部落、返回歐洲遊說奧國、英國等國家到清帝國「化外之地」的區域進行殖民而未受到各國積極的回應、於馬達加斯加島與法國政府對抗失敗，秀姑巒溪口等處的臺灣原住民部落避開了歐洲的殖民掠奪史。³⁷

二、與非「秀姑巒二十四社」阿美族番社的衝突或戰鬥

「秀姑巒二十四社」各社之間並未相互隸屬，其彼此可能以自己部落的利益為優先考量，而存在著同盟或敵對的關係；有些部落或許是因為由鄰近古老的部落，例如奇密社（奇美，kiwit）、琅仔山社（貓公山、貓公山，tsilangasan）分社而來，或是某部落的小分社，而有攻守同盟的關係，但大致上各自都是獨立的部落。

而在清帝國國家力量進入之後，或許是基於具有血緣或姻親關係，但也可能是因為遭遇軍隊及漢人墾民的入侵，彼此同仇敵愾，因而在光緒 3 年「烏漏事件」爆發時，有不少鄰近的部落加入抗官的行列，使清帝國在後山中路統治根基幾乎動搖，甚至戰火還從花東縱谷延燒到東海岸，成了「阿棉納事件」（即一般常說的「大港口事件」）。

36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板橋：稻鄉出版社，2000 年），頁 65、69；潘繼道，〈近代東臺灣秀姑巒溪口的族群互動〉，頁 3-7。

37 潘繼道，〈近代東臺灣秀姑巒溪口的族群互動〉，頁 9-10。

「秀孤巒二十四社」的部落之間會發生征戰，他們也會跟鄰近地區非「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其他阿美族部落爆發衝突或戰爭。

「秀孤巒二十四社」部落之間的武力衝突，例如馬太鞍社與太巴塢、奇美、大港口、高藥社之間的衝突或戰鬥。³⁸ 而跟鄰近地區非「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其他阿美族部落爆發的衝突或戰爭，例如大港口的部落被花東縱谷的 Batseral 社（Patsiral，今壽豐鄉）獵首；³⁹ 馬太鞍社與北方南勢阿美七腳川社之間的武力衝突；太巴塢社與南勢阿美里漏、薄薄社之間的衝突或戰鬥等。⁴⁰

但這些跟鄰近地區非「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其他阿美族番社的衝突或戰爭，並未對「秀孤巒」的交戰部落造成太大的影響。

（一）卑南族的威脅

「秀孤巒二十四社」中的馬太鞍社、太巴塢社等，也曾流傳跟南方的強敵卑南族發生戰事的傳說。

早期卑南族人以其嚴密的社會制度（其以會所制度、年齡階級制度著稱），及擁有強大的戰鬥力，支配後山南部達數百年。⁴¹ 早期移入其勢力範圍的族群，必須徵得其同意，否則有被襲擊的可能。其支配力相當強大，玉里鎮、長濱鄉以南都是其狩獵範圍。⁴²

38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252；林道生編著，《阿美族的口碑傳說故事》（臺北：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1999 年），頁 39-42；石忠山主編，《太巴塢部落志》（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8 年），頁 165-166；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153、158、178；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 136；劉金英，〈太巴塢部落與馬太鞍部落之接觸、衝突、部落認同〉（花蓮：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頁 23、86-92、131。

39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頁 68-69；潘繼道，〈近代東臺灣秀姑巒溪口的族群互動〉，頁 5。

40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249-253。

41 金榮華，《臺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9 年），頁 13；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板橋：稻鄉出版社，1990 年），頁 51。

42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47-48。而在東臺灣的布農族丹番（丹社群）與巒番（巒社群）、西拉雅族等，都曾留下遭受卑南族阻撓、攻擊的傳說（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 44-45、111-112）。

馬太鞍社的傳說中，曾提及與卑南族人作戰過，並使得卑南族大將戰死；⁴³ 太巴塌社的 Sawa 傳說故事，則提及卑南族人來到部落擄走 Sawa，以及之後雙方發生了戰爭。⁴⁴

而隨著道光年間南臺灣的西拉雅族人移入今富里鄉之後，西拉雅族成為「秀姑巒二十四社」與卑南族中間的緩衝區，使得「秀姑巒二十四社」避開與卑南社的直接戰鬥。

（二）布農族人的襲擊

布農族原分佈在臺灣中部山地的西側，原有六個同祖群，即巒社群、卡社群、丹社群、卓社群、郡社群及蘭社群。⁴⁵ 其中，巒社群、丹社群、郡社群的部分族人遷移到臺灣後山，在晚清的文獻上被稱為「巒番」、「丹番」及「棍番」（郡番）。在夏獻綸的《臺灣輿圖》中提到：

此外，如木瓜番、丹番、巒番、棍番（郡番），俱處高山，社名不一；或撫、或否，尚難悉數。平地之番，稍知耕種；處深山者惟事遊獵，與平地番世仇，兇殘嗜殺。番性大概然也。⁴⁶

第一批來到東臺灣的丹社群布農族人，約在 250 至 300 年前遷移而來。18 世紀初葉，丹社群布農族人出獵至中央山脈東側發現熟粟穗（小米），知地質肥沃可耕，因而率領部分族人移往後山，進入太平溪（即塔巴拉溪，卓溪鄉）中游地帶及靠近山腳地帶的高地。由於距離和地形的關係，丹社群較其他布農族群容易越過中央山脈；而且由於比別人移動得早，在後山山地獲得了廣大的領土。後來丹社群又向下游山麓擴張，但因平地已有秀姑巒阿美聚居，乃與之訂約於紅葉溪，以劃分彼此獵場，互不侵犯。

43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252-253。

44 林道生編著，《阿美族的口碑傳說故事》，頁 43-49；石忠山主編，《太巴塌部落志》，頁 161-163。

45 蘭社群因人口很少，且受鄒族達邦人同化，固有文化幾乎不存。

46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6。

當時東臺灣南部勢力強大的卑南族恃勢欺凌，使丹社群畏懼，因而退回到太平溪中游山麓。其後丹社群出獵於新開園（池上鄉錦園村）時受窘於卑南族，於是請和，結果獲得卑南族允許，雙方互換弓矢以為信，相約下次月圓夜各率族人訂盟於此。屆時，雙方族人聚集新開園，議訂鼈溪以南（富里鄉富里村、永豐村、豐南村一線以南）屬於卑南族，以北屬於丹社群，各不越界狩獵。盟約成立，丹社群以鹿皮裘、羊皮裘一襲贈予卑南族，卑南族則只以布褲一件回贈。自此，兩族相安，丹社群於是又得向太平溪下游拓展，並遠及紅葉溪與馬蘭鉤溪流域。⁴⁷

而根據胡傳《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載的「水尾璞石閣迤西高山各社」，丹社群的部落大體上是分佈在水尾西北與西邊，包含興武郡社、納食達社、與弗東社（兼管馬媽賀社）、與實骨丹社、座主板社等。⁴⁸

丹社群的勢力，一度向北擴張到馬太鞍溪一帶，卻因受到北方木瓜番（木瓜群，Takedaya、Pulevao 或 Mokui、Vaguai）內部的族群競爭波及，逐漸向南移動，勢力萎縮到富源（屬於瑞穗鄉）、馬遠（屬於萬榮鄉）以南的區域。⁴⁹

根據《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所採集的口述歷史，高藥社（可能就是「膏肓社」，瑞穗鄉瑞祥村），其一度遭遇丹社群的攻擊而遷社。當時高藥社人避難至今瑞穗鄉鶴岡村境內烏漏溪下游右岸臺地，另建一社，社名仍稱為高藥。但之後又遭到馬太鞍阿美族人攻擊，流散至今玉里鎮河東地區。⁵⁰

猛仔蘭社位於今玉里鎮河東地區松浦里轄區，猛仔蘭社為高藥社遷移者

47 丘其謙，《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6 年），頁 9-11。

48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1-32。

49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94-95；瓦歷斯·諾幹、余光弘著，《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頁 128-129。

50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153、158、176、178、180、188-189；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 136。

所建。根據阿美族人的傳說，晚清曾發生「高藥事件」，起因於高藥社青年與馬太鞍社青年在今馬蘭鉤溪中游捕魚發生格鬥，馬太鞍人輸了，暗中邀布農族人乘夜突襲高藥，殘殺家畜，放火燒燬房舍，高藥社一夕之間灰燼處處，族人不得不被迫分散他處。其中有位勢力者 Monah 的一支系，遷至猛仔蘭社東南高地。日治時期，日人興建西側道路（今縣道 193 之前身）後，將高藥社人遷至猛仔蘭現址。此外，觀音部落（觀音山）的阿美族人，亦以高藥社的後裔佔多數。⁵¹

而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也提及高藥社被布農族丹社群襲擊一事，使其社眾移往秀姑巒溪東岸；另外，在烏漏社西南方的舊加納納社（瑞穗鄉舞鶴村），因丹社群的攻擊，社眾乃移往卑南阿美的嘎撈吧灣社（東河鄉泰安村）、海岸阿美的都威（成功鎮博愛里重安）、微沙鹿社（成功鎮忠孝里美山），及秀姑巒溪東岸。⁵² 以致於在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及田代安定調查時，舊加納納社並未出現在「木瓜溪至水尾溪北岸各社」的統計資料中。⁵³

事實上到了晚清劉銘傳時期，布農族仍在襲擊後山中路的莊社。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中的〈臺灣府轉飭緝捕水尾下撈八灣等地殺人兇番並嚴禁越境〉即提到：

照得後山各社，其番眾薙髮之後，尚能守法；即素行強悍之社，至此亦稍知斂跡，不敢嗜殺為非。惟上年十一月內水尾屬下之撈八灣〔按：原誤，應改為「惟上年十一月內水尾屬之下撈八灣」〕及連崗埔，同日被生番殺斃墾民陳簡等三命；敝統領遠在南路，聞報後即分飭高山通事、社長等嚴緝正兇，日久未獲。本月十四

51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158、176、178、180；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 — 阿美族史篇》，頁 136、155-157。

52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41。

53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29；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7-267。

日，又據拔仔莊之烏漏四物社通事熊王慶、社長王手馬等稟稱：又被生番竊殺新田之番婦二人。敝統領當飭各通事等跟踪緝兇，期在必獲。旋據該通事等稟覆到營：現據高山之座主板、小納納兩社番眾僉稱先後竊殺之案，均係前山總通事張昌該管之內阿老、內本轆兩社之所為；每起約四、五十，為首者係哪骨律等語。⁵⁴

下撈八灣在海岸山脈山中，也就是阿那八彎、下勞把灣（ハラウバワン，Haraubawan，東河鄉泰安村），⁵⁵ 內本轆即是內本鹿（Laipunuk，延平鄉紅葉鹿野溪上游）。若上述說法屬實，那麼發動攻擊的布農族人不是丹社群人，而是屬於郡社群人。

雖然清帝國國家力量進入了，但布農族人仍對「秀孤巒二十四社」部分部落發動襲擊，造成傷亡及遷社。

（三）西拉雅族人的東移

西拉雅族人（平埔番）並非後山在地的原住民族，其原居住地在今南臺灣的平原及近山地區，約於清道光 9 年（1829）之後從下淡水溪（高屏溪）、東港溪、楠仔仙溪、荖濃溪等流域、恆春半島等地移住進來。其並非一次即集體移入東臺灣，而是在不同時間因應不同需求而進入。⁵⁶

西拉雅人在道光 16 年（1836）移居今玉里鎮長良里後，為爭奪秀姑巒溪東邊原屬於阿美族人的土地，乃與阿美族人展開激烈的戰鬥。

由於周遭的阿美族、布農族巒社群、卑南族之間處得並不和睦，西拉雅人必須集村生活，才能凝聚族人力量，並防禦鄰近生番的侵擾。其最初藉著與巒社人修睦，以免除來自後方中央山地的威脅，並換得粟和米，使族人度過拓墾完成之前飢餓的窘迫生活。由於此地的土地甚多、人力不足，及四周

5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頁 265。

55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2；黃清琦編，《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 90；姜國彰，〈東河鄉〉，收於王世慶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三·臺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86。

56 原居於南臺灣的西拉雅族，包括西拉雅、大滿（大武壠）、馬卡道三個亞族。

情勢險惡，因此藉由布農族郡社人的允許與協助，而有經里壠（關山地區）山區回前山向族親招墾的舉動。

隨著荖濃溪、下淡水流域的族人陸續前來，西拉雅人拓墾日漸廣闊，勢力也逐漸壯大，並藉著與卑南族人通婚來互通聲氣，於道光 22 年（1842）一舉將長良對岸的阿美族人擊敗而佔有其地，並將族社勢力建立在以大莊（大庄，富里鄉東里村）為中心的富里鄉境內。⁵⁷

在西拉雅人東移、建立新家園的過程中，曾以武力驅趕在今富里鄉秀姑巒溪東岸的阿美族人，使得今富里鄉、玉里鎮河東地區成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一直到光緒 14 年（1888）「大莊事件」（大庄事件）以及光緒 22 年（1896）清殘兵攻擊後山中路的西拉雅族人，使他們勢力瓦解之後，阿美族人才慢慢往這地區遷移，建立據點。

（四）木瓜番獵首的威脅

木瓜番（木瓜群）於約 300 年前從今南投縣的仁愛鄉翻越中央山脈，遷徙到東臺灣的木瓜溪、清水流域以後，就與居住於今吉安鄉、壽豐鄉的南勢阿美族等往來，他們一度成為臺灣東、西部物物交換的中間商，將花東縱谷、東海岸的物資帶往埔里交易，並把中央山脈西邊的物產帶到東邊來，這種商業行為據說一直到巴都蘭番來了之後才終止。⁵⁸

木瓜番除了跟南勢阿美族人進行物物交換之外，其交換範圍甚至遠達東海岸秀姑巒溪口的部落。

前述在嘉慶 8 年（1803）漂流到秀姑巒溪口，並於當地生活了四年多的日本人文助，在其見聞中即提到：在當地嫁給漢人商家的婦人，平常

57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 98-114、124-133；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年），頁 297-301；林燈炎譯，林清財校註，〈大庄「沿革」手寫文獻解說與摘譯〉，《臺灣風物》，37 卷 4 期（1987 年），頁 111-113；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本署編著，翁佳音、陳怡宏譯著，《平埔蕃調查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年），頁 110-111；筒井太郎，《東部臺灣案內》（臺東：東部臺灣協會，1932 年），頁 105；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66；黃宣衛、羅素玫，《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年），頁 38。

58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頁 33、342；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4 期（1978 年），頁 65-74。

會利用貝類製作裝飾品，與秀姑巒溪上游、中央山脈一帶的布農族（イワタン，Iwatan）及木瓜番（崇爻，チョーガワ或ツオガウ，Chyougawa 或 Tsuogau、Tsuongau）交易，並帶回他們的山產。其中，對於木瓜番方面，曾提到雙方有戰爭、馘首的事情發生，他就曾親自看到當地人在活捉木瓜番回來後聚眾設宴，先餵食俘虜兩、三天，然後將其首級及兩手、兩腳切割，一面高舉著在部落間巡迴遊行，一面則高呼「チョーガワ、チョーガワ」（崇爻、崇爻）。⁵⁹

在南勢阿美族人居住的南方，是木瓜番活躍的區域，根據口述歷史資料，木瓜番就曾偷襲過秀姑巒阿美的馬太鞍社人。

有一次約有 500 名的馬太鞍社人挑蘆草到花蓮港（今吉安鄉海邊）一帶販賣，在回家的路上，先行部隊 200 人在今壽豐東南方的河邊上遭遇到 300 名木瓜番的襲擊，混戰多時後馬太鞍人 6 名死亡；而當木瓜番有 1 人被殺後，木瓜番才收兵歸去。⁶⁰

在花東縱谷地區，除了馬太鞍社曾遭到木瓜番襲擊之外，據說在今壽豐鄉、鳳林鎮北部原本也有阿美族人分布，由於不堪木瓜番的攻擊而遷徙，⁶¹此處即成為木瓜番的狩獵地，及族群間的緩衝區、分界線。⁶²

而在海岸阿美族的口傳歷史資料中，也多次提到木瓜番到海岸山脈狩獵及出草，是彼等南遷的重要因素，使得自水蓮尾（壽豐鄉水璉村）至丁仔漏（豐濱鄉豐濱村）附近的海岸阿美族人，因遭到襲擊，被迫放棄故居遷徙他處。⁶³到了晚清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仍提到：

59 秦貞廉編輯，〈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ブラン嶋之記〉，頁 26、46-47；山中樵，〈註〉，收入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編輯，《愛書》，第 12 輯（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1940 年），頁 3。

60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251-252。

61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09、506；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頁 276-277。

62 馬太鞍稍北的地區，屬於木瓜番的狩獵地區，因而形成秀姑巒阿美與南勢阿美的分界線。參見阮昌銳，《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9 年），頁 8；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載其所著《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頁 142-143。

63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214-216；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族史——阿美族史篇》，頁 179、188、194、202、233；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397、399、405、409-417、419-420、434、436、451、453、498、507、540；黃宣衛、羅素玫，《臺東縣史·阿美族篇》，頁 40。

自猫公社（豐濱）沿海以北至花蓮港六十五里之間，亦有可墾之地。從前阿眉番（阿美族）曾開墾成熟，今為木瓜番時出殺害，避而遷去，路遂不通。⁶⁴

亦即木瓜番的襲擊，是猫公社以北東海岸阿美族部落遷移的重要原因。

（五）晚清國家力量與漢人侵墾的威脅

同治 13 年（1874）日本出兵南臺灣的「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帝國開始注意到原住民生活的區域「番地」經營的重要性，因為如果仍將之視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置之不理的話，將使得外國勢力有藉口，而對「番地」產生覬覦之心。因此，在欽差大臣沈葆楨的建議之下，清帝國展開了「開山撫番」，以宣示對後山的主權。

當時先以兵工由北、中、南三路開墾通往後山的番界道路，接著在重要據點駐紮軍隊（勇營）。隨著光緒元年（1875）卑南廳的設立，後山正式進入清帝國版圖。

為了達到移民實邊，沈葆楨認為必須將之前阻礙移民的禁令加以解除。在其建議下，清帝國正式解除海禁與山禁，並提供優渥條件，進行官招民墾與民招民墾，使漢人墾民進入後山。⁶⁵

漢人移墾時，容易侵墾鄰近原住民的土地而造成衝突。但漢人農民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其背後提供保護的清帝國官軍武力，甚至「秀孤巒二十四社」遭遇過最大的原住民威脅，都沒有比國家力量進入後的威脅來得大。

過去原住民族群因應自身需要，包括守護部落族人或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對於鄰近族社會發動獵首或攻擊行動，但很少出現「滅族」戰爭；但清帝國國家力量進入之後，只要是被認定為有可能出現危害帝國統治之虞的，則將會帶來「喪身滅社」的恐怕後果。

64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5。

65 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頁 63-70。

光緒 3-4 年發生於後山中路阿美族的抗清事件，包括「烏漏事件」、「阿棉納納事件」，正是國家力量進入之後與部落產生衝突，所引爆的一連串「官」「原」之戰。

包含「秀孤巒二十四社」在內的阿美族各部落，原本就有自己的傳統領域、社會體制與規範；國家力量進入後，並未真正瞭解原住民的狀況、社會文化，或是思考平等地跟原住民合作，而只是單方面要求原住民配合、接受國家的政策，以清人的需要與想法來指揮部落、指揮頭目、凌駕於部落領導階層之上，甚至藉由通事的招撫，來達成統治力量的介入，如此容易因雙方的不瞭解，而產生不必要的摩擦。

此外，軍隊移紮之後的屯田，與漢人農民進入之後的招墾，勢必衝擊到當地原住民族群的生活空間。如果當時又有官軍或通事在部落中作威作福，勢必引起大的衝突。中路阿美族社的抗清行動，就是在這時空環境下的產物。

光緒 3 年，由於清帝國官軍進行調動，從北路、中央山地陸續移紮至「秀孤巒」區域，並展開官兵屯田，壓迫鄰近阿美族人的生活空間；再加上該年 5 月又遭逢颱風侵襲，需要動員大批阿美族人勞力整建營舍，這種種狀況讓烏漏、阿棉、納納等社阿美族人不愉快的感覺都交織在一起，自然容易引發大的糾紛，最後並演變成為反抗清帝國官軍的大動亂。⁶⁶

無疑的花東縱谷的烏漏社，正是引爆這一連串衝突的起點，但這場戰爭的導火線是因為清軍進來後山中路之後才埋下的，其殺害清人也可能是因為對方某些作為造成他們不得不反抗所致。⁶⁷ 最後這場戰事從花東縱谷延燒至東海岸。

66 潘繼道，〈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阿美族抗清事件之研究〉，頁 160-165。

67 潘繼道，〈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阿美族抗清事件之研究〉，頁 157-160。

縱谷烏漏社附近的拔仔莊四社、馬太鞍、太巴塢等社，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曾捲入，但在見識到清軍的威力之後，紛紛薙髮求撫，不敢再反；但戰火延燒到東海岸之後，造成阿棉、納納社青壯死傷慘重，甚至有「關門屠殺」的故事不斷流傳。⁶⁸

戰爭落幕後，清帝國確立在後山中路的統治地位，並使中路、北路聲氣相通。烏漏社於戰敗後，被更換了社名，成為「化良社」；阿棉、納納社，則是在戰爭之後勢力瓦解、人數銳減，甚至流落外地，直到清軍撤離之後，部分族人才又再回到舊部落；而協助阿棉社的姑律、大蘇圓、沙老等部落，則遭遇部落被焚燬的厄運。⁶⁹

在清軍強勢支配，以及如果反抗即可能帶來「喪身滅社」的威脅統治下，中路阿美族各社不敢稍有反抗，一直要到光緒 14 年 6 月底開始的平埔族人、客家人等因田畝清丈單費所引爆的「大莊事件」嚴重衝突時，部分的阿美族人才又再度出現於抗清的行列當中。⁷⁰

在中路抗清事件落幕後，除前述最先反抗的烏漏社被改為「化良社」之外，很有意思的在晚清胡傳的《臺東州採訪冊》記錄中，馬太鞍附近也出現兩個部落被改社名，成為「良化」與「善化」。

至於到底是因為中路這場抗清事件而改的，抑或是其後在光緒 14 年「大莊事件」參與抗清行動而被替換社名，目前無法確知。但可以知道的就是對反抗者改社名的措施，雖然最早不是出現在後山，⁷¹但這樣的善後方式，

68 「關門屠殺」的地點，在靜浦國小操場附近的竹林一帶。參見潘繼道，〈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阿美族抗清事件之研究〉，頁 165-166。

69 潘繼道，〈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阿美族抗清事件之研究〉，頁 175-178。

70 關於「大莊事件」，請參閱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 171-184。

71 劉良璧的〈沙轆行〉，即記錄到雍正年間大甲西社等參與抗清事件後，沙轆（臺中市沙鹿）改為「遷善社」、牛罵（臺中市清水）改為「感恩社」、大甲西（臺中市大甲）改為「德化社」。參見劉良璧，〈沙轆行〉，收於《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第 4 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598。

在中路阿美族抗清事件後仍不斷上演，希望藉由這樣的措施來改變部落的性格，期待他們不再反抗清帝國統治。⁷²

而在事件落幕之後，烏漏、阿棉、納納等社與光緒 4 年於後山北路抗清的加禮宛社，都成了吳光亮〈化番俚言〉宣傳的教材，⁷³ 透過「喪身滅社」怵目驚心的強烈報復文字，威脅、恐嚇各社不得反叛。

此外，從口述傳說中可以看到事件後阿棉社與納納社的族人擔心遭受清軍報復，紛紛逃散到拔子莊（瑞穗鄉富源、富民、富興等村）、貓公（豐濱村）、新社（新社村）、丁仔漏（豐濱村）、麻荖漏（成功鎮忠孝里）、僅那鹿角（長濱鄉寧埔村光榮部落）、石坑（長濱村長光部落）、石寧埔（長濱鄉寧埔村）、沙汝灣（成功鎮宜灣部落）、大俱來（長濱鄉三間村）、姑仔律（長濱鄉樟原村）、馬稼海（長濱鄉三間村真柄部落）……等地。⁷⁴ 其後，有部分族人或其他部落的人遷入原部落。

這場戰爭使得「秀孤巒二十四社」的烏漏、阿棉、納納等社勢力重創。

戰爭前，據清帝國官軍聲稱反抗的族社可以動員數千人；但在戰爭後，經過慘烈殺戮及遷徙，其勢力已無法跟清軍為敵。在晚清（光緒 18、19 年左右）《臺東州采訪冊》的記錄中，化良社（烏漏）只剩男、女 400 餘人；北溪頭社（日治初田代安定記為「北頭溪社」，即大港口，原阿棉社範圍）只剩男、女 185 人；納納社只有男、女 280 人。但在阿棉及納納社中，有多少是原部落族人，則無法確知。而曾遭焚燬的沙老社，人數不明；姑律社，男、女有 60 餘人，⁷⁵ 是否全為阿美族人或是原部落分子，亦無法確知，其中可能也雜有「加禮宛事件」之後南遷的噶瑪蘭族人。

72 之後改社名的處分，在後山不斷地上演。例如光緒 4 年「加禮宛事件」後，回到原部落的撒奇萊雅族竹窩宛社（達固部灣、達固湖灣，Dagubuyan、Takoboan），被改為「歸化社」；而口述歷史資料中被遷往馬太鞍附近的噶瑪蘭族人部落，則被改為「鎮平社」。參見潘繼道，〈晚清「開山撫番」下臺灣後山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之研究〉，《臺灣風物》，52 卷 4 期（2002 年），頁 77-79。

73 吳光亮，〈化番俚言〉，載於《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生熟番紀事》合訂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37、42-43。

74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225-229；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族史——阿美族史篇》，頁 190-192。

75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29-30。

到了日治初期（1896）田代安定調查時，化良社男 222 人、女 198 人，合計 420 人；北頭溪社男 120 人、女 110 人，合計 230 人；納納社（一名早滅〔威？〕社）男 81 人、女 80 人，合計 161 人；沙老社男 122 人、女 116 人，合計 238 人；而姑律社成了姑律庄，亦即已非阿美族人所構成的番社，而成為平埔族的聚落，當時居住的全為噶瑪蘭族人，包括男 41 人、女 39 人，合計 80 人。⁷⁶

伍、清日政權交替下「秀孤巒阿美二十四社」的變遷

一、番社擴散

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莊社〉在漢人、平埔族的民莊之外，也有附番社的社名、戶口與人口數（請參閱表 2）。⁷⁷

如果對照前述的表 1，可以發現番社有一些增減，其中也提到加納納與丁仔老「今已無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今玉里鎮縣道 193 的「河東地區」出現下撈灣、苓子兩社。其中的「下撈灣社」，在日治初田代安定記為「達仔丸庄，一名下勞灣社，平埔熟蕃」，亦即《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載的「下撈灣社」，其居民很有可能不是阿美族人，而是西拉雅族人。

表 2 晚清後山中路秀姑巒阿美族番社

番社	戶數	人口
化良（烏漏）		400 餘
週武洞	235	皆在拔子莊 共計 1,371
巫老僧		
人子山		
烏漏四物		

76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60、263、289-290。

77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18-38。

高溪坪		181
烏鴉立	52	420
加納納		今已無人
下撈灣	13	82（西拉雅族人？）
苓子	42	140
奇密	61	420 餘
大肚壓	52	350 餘
丁仔老		今已無人
八里環	20	130 餘
姑律	16	60 餘（噶瑪蘭族人？）
北溪頭（即大港口）	29	185
納納	32	280
馬大安	424	四社相連，2,065
良化		
善化		
則朱芒		
大巴塢	247	三社相連 1,737
馬於文		
沙老		

資料來源：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29-31。

在明治 29 年 8 月至 12 月之間，為了調查東臺灣是否適合進行日本內地人移民，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技師田代安定曾前來東部進行殖民適地的「豫察」，並撰寫了《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⁷⁸

書中也記錄了晚清後山中路「秀孤巒阿美二十四社」於日治初期的調查統計資料（請參閱表 3）。

78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緒言〉，《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1。

表 3 晚清後山中路秀姑巒阿美族番社於日治初期的調查統計資料

蕃社	戶數	人口
馬大安	178	917
節朱茫（則朱芒）	64	356
本老安	61	281
晚見蛋	63	327
大巴塿	151	795
馬意文（馬於文）	55	266
沙老	42	238
周武洞（週武洞）	72	397
人仔山	85	566
巫老僧	86	570
周塿	29	201
化良	79	420
大肚壓	57	393
高溪坪	30	182
烏鴉立	45	365
打落媽	10	43
奇蜜（奇密）	77	551
哨八埔（掃叭頂）	9	43
迪街庄（迪階，三民）	7	39
新塿庄（針塿，大禹）	（3 人受雇寄住）	3
璞石閣庄（玉里）	8	36
謝竹武（蛇竹高、下德武）	32	199

苓仔濟（能仔濟社、玲仔庄社）	45	269
識羅（織羅社、節老社，春日）	20	85
媽打淋（馬露蘭社、馬太林）	24	41
媽汝庄（麻汝）	7	25
馬露蘭來福（呂福）	23	136
蚊識蘭 （望則安社、馬露蘭猛之蘭社、猛仔蘭）	26	144
扒至律（川岸）	不詳	不詳
馬龜答（馬久塔）	3	12
大狗寮（高寮）	17（16）	77（76）
納納（早威）	27	161
北頭溪	32	230
貓公（猫公）	21	113
八里環	32	129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65-270。

表 3 中出現了「哨八埔」，應該就是今瑞穗鄉舞鶴村的「掃叭」、「掃叭頂」；打落媽，應該就是今瑞穗鄉鶴岡村的「打羅馬」，之前在晚清夏獻綸的《臺灣輿圖》，以及胡傳編撰的《臺東州采訪冊》中，並沒有記錄當地有阿美族部落存在。部分漢人或平埔族人為主的迪街庄、新塹庄、璞石閣庄、媽汝庄也出現阿美族人。

而從迪街到大狗寮，是屬於今玉里鎮轄域，尤其是謝竹武之後的各蕃社，位於今縣道 193 的「河東地區」，但在《臺東州采訪冊》的記錄中，只看到苓子一社。而東海岸的貓公社，則是又出現在田代安定的記錄中。

如果觀察從晚清到日治初期後山中路阿美族番社所出現的變化（請參閱表 4），可以發現有些番社仍持續存在並被記錄著，有些則是消失了蹤影。

十七至十九世紀阿美族「秀姑巒二十四社」的歷史變遷

表 4 晚清至日治初期後山中路秀姑巒阿美族番社記錄變化表

出版年代	1879	1894	1900
出處	《臺灣輿圖》	《臺東州采訪冊》	《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
作者	夏獻綸	胡傳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田代安定）
部落名稱	大巴籠	大巴塿	大巴塿
	加露巒		
	馬大鞍	馬大安	馬大安
	馬見弄	良化社？	
	則朱芒	則朱芒	節朱芒
	本老安	善化社？	本老安
	猫公		貓公（猫公）
	新社仔		
	麻吉蛋		晚見蛋
	琅仔山	人子山	人仔山
	阿棉山	北溪頭（即大港口）	北頭溪
	膏肓		
	周武洞	週武洞	周武洞
	人仔山		
	烏漏四物	烏漏四物	
	無老僧	巫老僧	巫老僧
	奇密	奇密	奇蜜
	納納	納納	納納（早威）
	烏漏	化良（烏漏）	化良
	大肚偃	大肚壓	大肚壓
	周塿		周塿
	加納納	加納納（今已無人）	

部落名稱	烏鴉立	烏鴉立	烏鴉立
	奇竹		
		沙老	沙老
		馬於文	馬意文
		高溪坪	高溪坪
			打落媽
		苓子	苓仔濟（能仔濟、玲仔庄社）
		八里環	八里環
		丁仔老（今已無人）	
			哨八埔（掃叭頂）
			迪街庄（迪階，三民）
			新塋庄（針塋，大禹）
			璞石閣庄（玉里）
			謝竹武（蛇竹高）
			識羅（織羅社、節老社）
			媽打淋（馬露蘭社）
			媽汝庄
			馬露蘭來福
			蚊識蘭 （望則安社、馬露蘭猛之蘭社）
			扒至律（川岸）
			馬龜答（馬久塔）
			大狗寮（高寮）
		下撈灣	
		姑律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文表 1、表 2、表 3。

從晚清到日治初期所出現的記錄差異，如果不是胡傳時期調查的疏漏，那就代表「秀姑巒二十四社」向南擴張了勢力範圍，進入到今玉里鎮轄區，跨越秀姑巒溪兩岸。

根據林聖欽的研究，阿美族人在日治初期，至少在明治 37 年（1904）以前，已經在今玉里鎮建立 Tokar（觀音山）、Tifuna（鐵份）、Amisan（下勝灣）、Malagusu 及 Bajilan（甕索社）。在明治 40 年（1907）之後，Bajilan（甕索社）人又向今富里鄉地區發展。

另外，也有來自於今鹿野鄉鹿寮社的臺東阿美族人、卑南鄉利基利吉社（卑南鄉利吉部落）的恆春阿美族人移居針塹（玉里鎮大禹里）。這些阿美族人所建立的部落，往往與先前移住的西拉雅族人緊鄰而居。⁷⁹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求行政管理方便，曾強制要求靠山邊居住的阿美族部落，遷往較平坦的地區，像呂福與馬太林部落為今玉里鎮轄區內最早被遷移的部落。

呂福部落原本位於 Launogan（現在部落東邊的海岸山脈地區），於明治 44 年（1911）左右先被遷移到 Dalaan，大正 8 年（1919）再遷移到今天部落所在地的位置。而馬太林也於明治 44 年左右，由東南邊的海岸山脈地區遷來現址。之後也有部分族社因為災害（針塹、高寮部落），或因修築花東鐵路（安通部落），或因衛生改善事業（中城部落）等因素，而有部落短距離搬遷的狀況。⁸⁰

關於日治初期秀姑巒地區與東海岸地區的庄社分布狀況，請參閱圖 3。

79 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1800-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頁 73-90。

80 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1800-1945）〉，頁 117-118。



圖3 日治初期秀姑巒、東海岸地區庄社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平野山岳區分概測地圖〉，《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

圖3中，於花東縱谷地區標示為「社」者，除馬佛社為噶瑪蘭族人、照員社（週望社與馬佛社之間）族社不詳之外，其居民大致都是屬於阿美族人。

東海岸納納社以北標示為「社」者，除「姑裂社」（姑律社、姑律庄）為噶瑪蘭族人之外，其居民亦大致都是屬於阿美族人。

（一）「秀姑巒阿美」的出現

日治初期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調查、撰著，明治33年（1900）出版的《臺灣蕃人事情》，取代了清帝國時期「生/熟番」分類，⁸¹其書中提到：

阿美族蕃人的分布，北從奇萊平原，南至卑南平原的北部；其他恆春地方亦有從臺東地方移住者。此等蕃人並非住在深山中，而

81 張隆志，〈帝國邊陲與殖民統治：十九世紀臺灣的「番地」問題〉，《歷史月刊》，199期（2004年），頁75。

是居住在平地或者緩傾斜地。為了方便說明阿美族蕃人，可暫時區分如下：

- 一、恆春阿美
- 二、卑南阿美
- 三、海岸阿美
- 四、秀姑巒（秀姑巒）阿美
- 五、奇萊阿美。

此並非從人類學上進行分類，只不過是為了說明上的方便，從地理做區隔。⁸²

當時，主要是依照地理分布來做區隔。書中亦提到「海岸阿美」的居住地交通不便，南邊從猴子山以北，北邊至烏路山以南之間，以及海岸的傾斜地；而「秀姑巒阿美」分布於北起花蓮溪的支流馬太鞍溪，南至新開園以北，他們在此開墾田園，但不是只有他們居住於此，也有漢人、平埔蕃族在此雜居。⁸³

大正3年（1914）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的《蕃族調查報告書》的第二冊，關於阿美族奇密社、太巴塢社、馬太鞍社、海岸蕃的調查，補助委員佐山融吉於〈前言〉提到：

阿美族人因其風俗習慣的差異，而分成北、中、南三支。一是居住在 Cyakang 溪（知亞干溪；今之壽豐溪）北邊，即北方阿美人聚集之處，又稱南勢蕃，主要為荳蘭社、薄薄社、里漏社。二是分布於 Cyakang 溪以南，秀姑巒溪一帶的秀姑巒蕃，主要以奇密

82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年），頁86-87。但之後的研究者大多將「奇萊阿美」稱為「南勢阿美」，沿用清帝國時期「南勢」的區分方式。

83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頁87。

社、太巴塢社、馬太鞍社、北頭溪社、馬稼海社為主。三是居住在都歷社及鹿寮以南者，主要有卑南阿美，以及海岸阿美的都歷社、都巒社、猴子山社、馬蘭社等……。⁸⁴

佐山融吉所提到的南勢蕃與秀姑巒蕃的分界線，是在今壽豐鄉與鳳林鎮交界的知亞干溪；而前述晚清時期夏獻綸的《臺灣輿圖》〈後山總圖〉所標註的北路岐萊（奇萊）與中路秀孤巒的分界，卻是在今吉安鄉與壽豐鄉交界的木瓜溪，兩者之所以不同，乃在於夏獻綸當時的官員等配合後山北、中、南三路的開發、統治或駐軍，對於所認知的空間，而劃定出木瓜溪成為分界線，事實上「秀姑巒二十四社」的最北邊，並未跨越過馬太鞍溪。

日治時期改以知亞干溪作為界線，乃因應南勢阿美，尤其是七腳川社於晚清光緒 4 年「加禮宛事件」之後勢力範圍的擴張，以及日治初期明治 41-42 年（1908-1909）「七腳川事件」之後七腳川社的本社遭到強制遷社，部分社眾被迫遷往今知亞干溪北邊的溪口，所形成的新族群邊界（南勢阿美的南界）所致。⁸⁵

從日治到戰後，「秀姑巒阿美」的分類名稱一直被相關研究者所沿用；而鹿野忠雄則主張「秀姑巒阿美」與「海岸阿美」合稱為「中阿美群」。⁸⁶晚清的「秀孤巒二十四社」，原本包括後山中路海岸山脈兩側，亦即除了花東縱谷之外，還有東海岸地帶；但到日治初期以後，「秀孤巒二十四社」東海岸地帶的番社，因為地理因素被歸類成「海岸阿美」，只剩下花東縱谷地帶的「秀姑巒阿美」，且分布空間往南邊擴散到晚清「璞石閣平埔八社」的分布地區，其中又有跟漢人或噶瑪蘭族人雜居的狀況。

8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阿美族奇密社太巴塢社馬太鞍社海岸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 年），頁 xxxv。

85 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頁 96-98、172、182、191-192、237。

86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頁 150。

秀姑巒阿美內部，原本就有因部落自身需要，或國家力量攻擊、其他原住民族社襲擊等，所引發的短、長距離遷徙；且各社有其不同的祖源、遷移傳說與歷史經驗，要將秀姑巒阿美的族群特色一致化、清楚界定，自然有其難度。

在經過日治至戰後時期人類學者的調查，尤其是馬淵東一等人的訪查，秀姑巒阿美的族群特色，大致歸類有「神降說」的創生神話，也就是天上的神降到地面而成為其始祖，不過這部分也普遍流傳於南勢阿美與海岸阿美；在發祥傳說方面，是以「高山洪水發祥說」為主，而在南勢阿美部落中也有此類型的傳說；此外，在今玉里鎮松浦里的馬久答社，則與海岸阿美、卑南阿美有類似「外島渡來」的遷徙傳說；而除開馬太鞍、太巴塌社之外，秀姑巒阿美當中有半數以上的村落與海岸阿美、卑南阿美、恆春阿美同樣，存在著「氏族制度」。⁸⁷

（二）族群邊界與廳界的劃分

明治 42 年（1909），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將臺灣原有的 20 廳併為 12 廳，花蓮港廳也從臺東廳劃出，東臺灣地區成為花蓮港廳與臺東廳並立的局面，奠定現行東部地區行政區劃的基礎。

當時分界的依據，在花東縱谷一帶是以新開園庄（指今整個池上鄉）為分界，原因是清末以新開園為界，以北屬於秀姑巒撫墾分局管理，以南歸卑南撫墾分局管理，為一現成的分界。⁸⁸ 此分界在前述夏獻綸《臺灣輿圖》的〈後山總圖〉中即可見到，而這分界其實也是「璞石閣平埔八社」的南邊界線。⁸⁹

而在東海岸一帶，為何不以秀姑巒溪河口的天然地形做為分界，原因是

87 黃宣衛、羅素玫，《臺東縣史·阿美族篇》，頁 28-35；黃宣衛，〈第一篇阿美族簡介〉，載其所著《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 年），頁 37-39。

88 孟祥瀚，《臺東縣史·開拓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年），頁 96。

89 黃清琦編，《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頁 89。

考慮當地的族群分界。

秀姑巒溪河口南北，是屬於阿美族群的分布地區，晚清稱為「秀孤巒二十四社」，其中包含秀姑巒溪口南邊的納納社（豐濱鄉靜浦村）；而水母丁庄至大峰峰社、大尖石庄一帶，則為加禮宛人的聚落，在晚清鄰近地區屬於西拉雅族的「成廣澳沿海八社」。依晚清時期的區劃，東海岸一帶以秀姑巒溪為分界，以北至花蓮港（吉安鄉里漏社海邊）屬奉鄉，以南至卑南溪屬廣鄉，但實際上奉鄉、廣鄉的分界，宜以「秀孤巒二十四社」以北屬奉鄉，「成廣澳沿海八社」以南屬廣鄉。

晚清東臺灣地區設「鄉」，原為徵稅，因當時於當地族群分界明顯，風俗習性各異的情況下，以族群為分界是較有利於徵稅的；而明治 30 年（1897）設辨務署時，南鄉、廣鄉便歸卑南辨務署管轄，因此，臺東、花蓮港分廳時，海岸一帶便以廣鄉為分界。⁹⁰ 亦即「秀孤巒二十四社」的族群邊界，成為後來日本當局劃分兩廳廳界時的重要依據。

陸、結語

「秀孤巒（秀姑巒）」最初並非作為河川或流域的名稱，從荷西時期以來，「秀孤巒」是以地名、山名、地區、族群的稱呼登場，歷經晚清至日治時期才成為河流的名稱。「秀孤巒二十四社」在明治 42 年（1909）花蓮港廳獨立設治時，甚至成為東海岸與臺東廳重要的劃界依據。

後山中路的阿美族族社，在晚清曾出現「秀孤巒二十四社」、「大巴籠等二十社、馬達安等四社」、「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等稱呼。其中，除了「秀孤巒二十四社」清楚說出二十四社的社名之外，其指涉範圍亦

90 孟祥瀚，《臺東縣史·開拓篇》，頁 96。

可看出跨越海岸山脈；其餘的稱呼則無法清楚其是否涵蓋海岸山脈兩側。而即使在日治初期，其指涉空間不再跨越海岸山脈，但仍以「秀姑巒阿美」的名稱繼續被沿用了。

「秀孤巒二十四社」在近代常出現與周遭族社展開零星或大規模的戰鬥、衝突，也曾發生遭受荷蘭東印度公司軍隊的攻擊，甚至遭到越獄者貝尼奧斯基等人襲擊的事件，但這些跟西方人的接觸，只能算是其族社發展史當中的小插曲。

西拉雅族、布農族、木瓜番等帶來的衝擊明顯較大，造成一些番社的遷移、讓出傳統領域；其餘「秀孤巒二十四社」內番社的衝突，或跟卑南族、鄰近地區非「秀孤巒二十四社」的其他阿美族番社發生的衝突或戰爭，並未對其造成太大的影響。其後，西拉雅族遭遇「大莊事件」、清日政權交替前清帝國殘兵的攻擊，勢力衰弱之後，「秀孤巒二十四社」的部分族人也慢慢遷移到今玉里鎮的「河東地區」建立據點。

但「牡丹社事件」之後進入的清帝國官軍，對「秀孤巒二十四社」帶來重大的改變與威脅，甚至「秀孤巒二十四社」遭遇過最大的原住民威脅，都沒有比國家力量進入後的威脅來得大。

從晚清到日治初期，「秀孤巒二十四社」記錄出現差異，如果不是胡傳時期調查出現疏漏，那就代表「秀孤巒二十四社」向南擴張了勢力範圍，在今玉里鎮「河東地區」設立不少新的據點。

日治初期，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對原住民各族進行調查，當時為了說明上的方便，以地理做區隔，將「秀孤巒二十四社」在花東縱谷的部落稱為「秀姑巒阿美」，而在東海岸的部落則是被歸類為「海岸阿美」。

從日治到戰後，「秀姑巒阿美」的分類名稱，一直被相關研究者所沿用，且分布空間往南邊擴散到晚清「璞石閣平埔八社」的分布地區。

參考書目

壹、中文資料

一、專書

丁日昌，〈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附臺灣中路築城防守片）〉，收於《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年。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二冊 阿美族 奇密社 太巴塢社 馬太鞍社 海岸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 年。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板橋：稻鄉出版社，1990 年。

丘其謙，《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6 年。

瓦歷斯·諾幹、余光弘著，《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石忠山主編，《太巴塢部落志》。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8 年。

何璟，〈奏陳阿棉老番馬腰兵等詭降受誅及現在番情安貼片〉，收於洪安全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年。

吳光亮，〈化番俚言〉，載於《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生熟番紀事》合訂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載其所著《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阮昌銳，《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9年。

孟祥瀚，《臺東縣史·開拓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年。

林道生編著，《阿美族的口碑傳說故事》。臺北：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1999年。

金榮華，《臺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9年。

姜國彰，〈東河鄉〉，收於王世慶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三·臺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夏獻綸，《臺灣輿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14年。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板橋：稻鄉出版社，2000年。

康培德編纂，《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年。

張振岳，〈玉里鎮〉，收於潘文富編，《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年。

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黃宣衛，〈第一篇 阿美族簡介〉，載其所著《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 年。

黃宣衛、羅素玫，《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年。

黃清琦編，《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年。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花蓮：作者自印，1985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本署編著，翁佳音、陳怡宏譯著，《平埔蕃調查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年。

劉良璧，〈沙轆行〉，收於《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第 4 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5 年。

潘繼道，〈近代東臺灣秀姑巒溪口的族群互動〉，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第 3 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

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8 年。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年。

鮑曉鷗撰文，李毓中譯，〈對《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一書之評論〉，《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58 期（1998 年）。

鮑曉鷗撰文，黃提銘譯，〈被征服的世界——十七世紀西班牙文獻資料中的臺灣北部原住民〉，收入《尋訪凱達格蘭族——凱達格蘭族的文化與現況》。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

二、期刊或學位論文

林聖欽，〈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1800-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林燈炎譯，林清財校註，〈大庄「沿革」手寫文獻解說與摘譯〉，《臺灣風物》，37 卷 4 期（1987 年），頁 107-124。

張隆志，〈帝國邊陲與殖民統治：十九世紀臺灣的「番地」問題〉，《歷史月刊》，199 期（2004 年），頁 69-75。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00 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4 期（1978 年），頁 61-206。

劉金英，〈太巴塢部落與馬太鞍部落之接觸、衝突、部落認同〉。花蓮：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潘繼道，〈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阿美族抗清事件之研究〉，《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3 期（2008 年），頁 143-186。

潘繼道，〈晚清「開山撫番」下臺灣後山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勢力消長之研究〉，《臺灣風物》，52 卷 4 期（2002 年），頁 39-94。

潘繼道，〈清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的「烏漏事件」〉，《東臺灣研究》，17 期（2011 年），頁 3-52。

三、網站

「花蓮縣光復鄉大馬太鞍社區發展協會」，收錄於「花蓮縣社會處網站」，網址：<https://welfare.hl.gov.tw/home/community/community-resource-front/update/52c527c37862e62201786343519004fa>（2022 年 7 月 22 日檢索）。

貳、日文資料

山中樵，〈註〉，收入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編輯，《愛書》，第 12 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1940 年。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22）—臺灣（2）》。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年。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 年。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年。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 第三 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年。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 年。

原世外，〈植民地としての臺東〉，《臺灣協會會報》，23 號（1900 年）。

秦貞廉編輯，〈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嶋之記〉，收入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編輯，《愛書》，第 12 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1940 年。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 年。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筒井太郎，《東部臺灣案内》。臺東：東部臺灣協會，1932 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

Historical changes of Xiuguluan twenty-four tribes in the Ami people between 17 and 19 centuries

Jih-Daw Pan *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uguluan” represented an area between Tafalong (Tavarong, Guangfu Township of Hualien County in present) and Chengguang'ao (Chenggong Town in Taitung County in present) in the Eastern Taiwan.

That was a place where 24 Amis' tribes called home and was also a location where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occurred.

Typical events include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Siraya, invasion of mountainous Bunun, attack from the Mokui (Vaguai, Takeday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pening of the mountains and pacifying of the barbarians” by the late Qing Empires. All these activit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people's lives in this area.

In this stud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se aboriginals from the Xiuguluan twenty-four trib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Xiuguluan Ami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 Xiuguluan, The Ami people, Xiuguluan Twenty-Four Tribes, National Power, Historical Chang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